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 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胡洪彬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 社会科学部, 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软实力,维护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若干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依然存在体制不完善等弊端,其根源与政府相关人员认识不到位,管理能力缺失,文化产业与事业难以区分和相关配套措施无法跟进密切相关。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树立新的发展观念,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相关制度,推进理论创新,培育现代市场体系,并加强比较研究、实证调研和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分析。

关键词:改革开放;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建设;研究回顾;前瞻

中图分类号: G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639X(2012) 01-0015-06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是党中央自十七大以来首次将“文化命题”作为中央全会的重大议题,充分体现了党在文化发展上的高度自觉和远见卓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学术界,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自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长期深入的分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理论成果。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的统计,自 1978 年至今,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有 640 余篇;公开出版的著作有刘克利等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研究》、罗争玉的《文化事业的改革与发展》等。此外理论界就此问题还召开了各类研讨会。为推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以期推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借鉴,现将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并对如何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研究提出一些想法。

一、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

发轫于 1978 年的文化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历了 30 多年。研究者在回顾文化体制改革历程时,将文化体制改革进程划分为若干历史阶段,观点主要有“二段论”、“三段论”、“四段论”三类,目前,学界持“三段论”学者较多。

第一类:二段论。此类观点把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在原有计划体制中逐步引入市场体制因素的过程,并以此为标准进行区间划分。如霍步刚^[1]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是一种计划体制存量逐步递减和市场体制因素不断增加的过程,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9 年至 2005 年,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和实验阶段,期间我国文化体制形成了一种计划调控与市场主导双圆结构和双轨并存的体制格局。第二阶段为 2005 年至今,2005 年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的结束,标志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目标和探索完成,由此开始进入深化和拓展阶段。

第二类:三段论。此类观点主要是以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历史事件为基点,对文化体制改革历程进行区分。如陈劲松^[2]认为,第一阶段从 1978 年至 1992 年,为文化体制所有制的变革与文化市场的建立阶段,这期间文化市场的发展和地位得到了承认,并且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文化功能的多样化,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第二阶段是从 1993 年至 2002 年,为国家财政投入机制变革与文化产业化阶段。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在改革中迅速发展,焕发出蓬勃生机。第三阶段是 2003 年至今,为制度全面创新与发展文化生产力阶段,我国文化产业不断走向规范,文化体制改革

收稿日期: 2011-10-25

作者简介: 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研究。

实现了由试点转入全面铺开的新阶段。

第三类:四段论。此类观点对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体制改革历程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区分。在邱仁富^[3]看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是从 1978 年至 1983 年为萌芽阶段,其中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体制进行扬弃,恢复传统优秀文化发展体制。其二是从 1984 年至 2001 年为探索阶段,期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展开,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逐步转向培育文化市场、完善文化市场管理等方面。其三是从 2002 年至 2007 年为全方位的展开阶段,期间十六大召开,随着文化体制建设上升为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任务,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也开始面临全新的机遇。其四是十七大至今为跨越发展阶段,十七大中的相关论述为文化体制改革跨越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现实支撑,同时也推动国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促进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阶段划分还尚无定论。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是在中央政策的直接引导下进行的,其中十四大、十六大、十七大等中央党代会的作用尤为突出和重大,因此按照历次党代会对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的相关规定,对文化体制改革历程的区分似乎更为贴切,更能反映出中央文化管理政策和体制的变化,国家文化发展和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特征和方向性转变也更为明显和突出。当然,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特征性的阶段划分,本身是一个多元化的问题,学者们研究视角不一致,研究侧重点存在区别,其结果就会存在差异,只要不存在政治定性问题,只要言之有据、述之有理就可,观点差别可以争论。

二、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和意义

关于推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学者们的观点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王立^[4]认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党在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切实实现要以党的执政能力提升为根本前提,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既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也要有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精神文化资源是党执政的重要资源。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质上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激励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精神动

力和思想保证,其既是提升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前提,也是推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社会意识多样化趋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各种意识形态相互碰撞的局面表明,只有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才能永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生机和活力,才能扩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实现文化与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精神支撑。

其二,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推进综合国力的提升。蒋香凤^[5]认为,文化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价值追求与审美情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身博大精深的独特文化,并将其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在当今世界,随着国际竞争中的日趋激烈,文化因素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愈发显得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利器。当前,一些西方国家为推行其价值理念,越来越重视文化、价值理念等意识形态的作用,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必将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构成很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助于参与全球文化交流,把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可以说,文化体制改革是推动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杠杆,也是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必由之路。

其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培育良好的文化发展机制,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李宏^[6]认为,体制改革是激活文化活力的必然选择。文化是一项具有创新性的事业,对要素的配置要求很高。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文化资源被不恰当地分割,得不到整体优化配置,导致我国文化发展的活力不强。李宏还认为,文化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独特的发展机制。尊重规律、创新机制,是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应当遵循的路子。积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市场化、差异化的改革原则,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努力把适宜进入市场的文化产品积极推向市场,参与竞争,以提升文化供给品质,同时,强化国家对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力度,使国家有充足的投入支持需要资助的文化事业,通过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方面的发展,实现公益性文化事业由政府主导,经营性文化产业由市场主导的协调局面。由

此,必将能够推动发展文化产业、规范文化市场秩序等多重目标的实现,最终形成一种充满活力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化大繁荣局面。

其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有助于维护和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权利,满足其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吴树新^[7]认为,公民权利是公民依法享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也是政府保障的合法权利。公民权利具有广泛性,文化选择与消费的权利是其中之一,从国家发展的角度而言,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文化需求,让民众享受丰富的文化生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逻辑要求,也是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责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群众对文化消费的需求不断高涨,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现代科技发展的支撑下,目前我国文化发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能够有效激发我国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文化创新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满足不同层次人们的文化需求,从而使民众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和发展先进文化的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三、中国文化体制的发展现状及改革困境

学者们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朝纵深方向迈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也取得了众多有效成果,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内,由于受国家发展进程中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当前我国的文化体制还有诸多方面没有理顺,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钻研和思考。陈用毅^[8]等认为,当前阻碍我国文化事业科学发展的体制羁绊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政府的职责和市场的作用划分不明确,致使政府在基本文化公共服务领域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求,其承担了过多市场可解决的任务,忽视了文化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属性及其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是文化服务大众的公益性和文化产业经营性的关系不明确,导致我国文化市场规模小、层次低,文化发展缺乏动力。

朱珊^[9]则直接指出了目前我国文化体制建设上存在不足的四个方面:(1)文化投融资机制尚不完善,过去单纯的财政拨款的文化发展体制难以为继,新的体制又未及时跟上,造成一定程度的规范真空与相关个人和组织行为失序现象的产生。(2)文

化艺术保护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导致许多文化单位改制后处境艰难,甚至一些地方性文化面临绝迹的危险。(3)文化产业与事业单位的运行机制尚未理顺。一些地方政府下设的事业单位,在文化发展上存在企业化经营模式与单位内部公益与非公益类产品并存的局面,意识形态与经济利益的矛盾时有发生。(4)文化监督实施机制尚未形成。虽然相关的文化规划、纲要等政策性文件陆续出台,但实施情况不佳,随意性和干预性较强,后续的监管力度不够。

可见,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文化体制建设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学术界对其客观现状仍持有一定的批判性意见。以此为基础,学者们进一步分析了当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现实困境。

其一,政府相关人员认识不到位。曹峰旗^[10]等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形成改革共识。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政府官员虽在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中已逐渐转变了思维模式,但在文化领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落后意识形态还一定程度地存在着,人们对文化体制改革缺乏开阔视野,许多人单纯地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会导致主流价值观的弱化,会改变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担心失去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权,结果导致其对进行文化体制改革缺乏动力,可以说,政府相关人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到位是构成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主观原因。

其二,政府文化管理能力缺失。解学芳^[11]认为,我国政府在文化发展上实施的辖地管理模式,其本身虽具有专业性强等优势,但极易导致文化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出现管理越位、缺位等制约管理能力提升的不良现象,尤其在当前文化产业高度融合的背景下,这种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将会造成国内文化市场出现各自为政和行政壁垒林立的局面,不利于统一、有序文化大市场的形成。加之地方政府对自身范围内政策的倾斜,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区域内文化市场主体间的不公平竞争。可见,如何打破条块分割,提升政府文化治理的整体能力,使得文化生产力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是当前突破体制瓶颈的关键所在。

其三,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混沌。谢武军^[12]认为,区别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原则下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是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但究竟何谓文化事业、何谓文化产业,目前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理论研究上都还未有明确的定

义和科学的规范,导致国家在实践层面上,对文化单位的转制、整合等方面表现出较大的主观随意性。譬如,我国的党报党刊、通讯社等虽为政治性和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但这些出版单位自身也要进入市场进行销售和赚取广告收益,若将它们定性为文化事业范畴,就很难摆脱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窠臼,这种“双轨制”的弊端,给文化体制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复杂性。

其四,相关配套措施难以有效跟进。白晋虎^[13]认为,文化体制并非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与经济发展、政治体制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需要多方面的支撑和保障,譬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冗余人员的分流,相关的利益构成的分配等都需要进行考虑。以浙江省歌舞团为例,其转制改企所需资金就近五千万,且主要用于补齐安置人员的社会保障费用,如此之高的成本在经济发达的浙江尚难承受,更不用说在落后地区了。在缺乏相关配套措施的前提下,许多原本有意进行体制改革的单位往往只能采用技术手段换汤不换药、以转换内部机制的形式来敷衍了事。

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围绕如何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理论界在不同阶段的历史背景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张解放思想,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念。梁勇^[14]认为,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切实做到解放思想,并在实践中树立以下三种观念:(1)要树立文化建设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一个内涵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系统,是多种因素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伟大事业,文化建设同政治进步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是其他方面发展的重要支撑,决不能忽略或轻视。(2)要树立文化发展也是硬道理的观念。当今时代,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已相互融合、不可分离,一个国家要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就必须把发展文化摆在突出位置,否则在产业分工上就会失去主导权,文化作为国家发展中的软实力,必须努力抓好、抓实。(3)要树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的观念。必须认识到走入市场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共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

能做到持续发展,当前要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其文化需求,就必须促使二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

其二,主张完善相关制度,实现文化体制建设的全面创新。丁和根^[15]认为,我国的文化体制基本上形成于计划体制时代,带着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当前市场体制框架内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不能光靠局部和短期的微调,只有依靠全面的制度创新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为此,他主张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应注重三个层面的体制创新。首先,在宏观层面上,要推进国家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政策的创新。通过完善文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合理界定政府与文化单位之间的关系,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有效指引,同时要完善文化产业的投融资渠道,努力拓宽文化市场发展的准入空间,提升文化竞争力。其次,在中观层面上,要推进各类行业协会行业自律和行业规范方面的制度创新。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文化行业协会的运行机制,促使协会组织按照市场需求进行运作,使它们真正担负起制定行业规范、规约行业行为,并为会员单位提供咨询服务等职能。最后在微观层面上,要推进文化事业和企业单位内部的组织与管理制度的创新,通过精心设计的教育、激励机制,使我国的文化事业单位成为机制灵活、运转高效、富有市场竞争活力的主体。

其三,主张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架构。陈洪博^[16]认为,针对目前政府在文化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效率低下和监督缺乏的弊端,政府必须明确自身定位,确保自身与文化机构间保持合适距离,既不能管得太多,也不能放任自流,并在实践中使自身的文化管理职能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政府的主要职责应定位于对文化产品的规划、引导和监管,以着力维护文化市场的稳定发展,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加强文化交流,营造文化发展的良好环境。二是从管理政府文化机构为主向管理全社会文化为主转变。政府管理应覆盖全社会,对整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制定规划和政策,鼓励和引导多种经济成分投入公共文化建设,形成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努力加强文化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三是从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经济法律手段管理为主转变。政府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程序,合理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增强对文化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使文化建设得到平衡发展和合理

布局,使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都得到满足。

其四,主张推进理论创新,建构与新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胡惠林^[17]认为,文化体制改革是有别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全新制度改革,其核心是转变党的执政方式,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文化执政能力,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仅是文化领域的一己之事,而是事关整个社会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重大变革。目前,我国关于改革的理论成果主要是建立在经济体制改革经验基础上的,如果不加区分地把经济体制改革的个别经验套用到文化体制改革中来,必将产生一些消极后果。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理论,通过分析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紧密关系,建立新的关于三者关系的理论体系,为国家文化制度创新提供理论支持与合法性依据。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是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并列,并有着同等重要性的表现形态。在推进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唯有对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文化流通、文化结构、文化组织、文化分配、文化权利等各方面做出深刻的理论分析,才能消除改革障碍,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向前迈进。

其五,主张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推进我国文化市场的繁荣。刘学民^[18]认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相适应的文化发展体制,因此,在改革过程中,除了要积极强调政府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外,更要积极树立市场视野,通过文化市场体系的完善,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奠定基础。为此他强调,一要加强文化产品市场建设。要加快建立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文化市场活力,重点培育图书报刊、影视娱乐等文化产品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文化需求。二要加强要素市场建设。通过对产权、人才、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的建设,努力为文化市场繁荣提供服务。同时,努力打破市场条块分割、城乡分离的不良格局,大力开拓农村文化市场,形成统一开放和有序竞争的文化要素流动市场。三要培育文化市场竞争主体,着力增强文化主体的活力,充分调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努力多出作品,出好作品,在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进程中,推进我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

五、结论与前瞻

以上综述表明,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我国文化

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也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为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但同时也看到,目前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

其一,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比较研究还较为缺乏。从已有成果来看,大多侧重于对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意义及其策略的探讨,横向的西方国家与国家间的比较分析还相对缺乏。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与建设问题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话题,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其政府部门都必将有所涉及,同时在我国国内不同层级的政府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因此比较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其二,课题研究重复多、创新少,缺乏实证分析。客观而言,截至目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统观之下发现高档次、有深度、影响大的力作实不多见。分析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有关“文化体制改革”的众多文章便可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均涉及文化体制改革必要性的宏观分析,其中许多观点大同小异,缺乏新意,尤其是有参考价值的实证探讨更是相对不足。事实上,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涉及到文化产业与市场发展的方方面面,其切实有效地开展,需要学者们对我国的文化发展现状以及民众的所思所想有清晰地把握,这就要求学者们走出书斋,深入实践去探索和调查。

其三,研究缺乏跨学科的综合分析。目前从事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界,他们大多是从我国文化体制发展的现状出发,进行就事论事的探讨,从其他角度、用其他方法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如从历史学和哲学等视角进行研究与探讨的成果相对较少。

鉴于此,笔者以为,当前该课题还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1) 加强比较分析。比较研究方法是理论工作者常使用的基本方法之一,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在文化建设与体制改革中的不同做法,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性,从中找到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有助于我们借鉴合理做法,规避不合理因素。如比较分析国内各省市间对文化产业发展和体制建设的实践经验,以找到有益的数据和做法,而国家之间同样也可以进行经验借鉴,如研究欧美发达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优秀经验等,尽管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与我存在差异,但其理念和做法并不妨碍为我所参考。当然,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注意结合具体的国

情,如此才能得出科学认识。

(2) 加强实证调研。只有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大量的观察、统计和调查,获取第一手客观材料,才能归纳出对文化体制改革出路的科学认识。为此,研究者应以更加饱满的姿态参与社会调研,用客观的眼光和务实的态度来审视当下我国的文化体制发展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科学路径。

(3) 加强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文化体制改革与我国的国家体制密切相关,又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因此,研究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实践中,首先应多从政治学和社会学这两大学科出发对其进行分析。同时,还应积极借鉴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多学科、多层次地加以研究。在研究范围上,既要注重对当前文化体制现状的考量,又要强化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阶段我国文化体制建设中一些优秀经验的分析。在研究对象上,既要注重从宏观层面研究文化体制问题,还要善于研究微观层次个别机构和组织的文化诉求,惟有如此,这一领域的研究才能不断走向深化。

参考文献:

- [1] 霍步刚,傅才武.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期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策略问题[J]. 中国软科学, 2007(8): 23-34.
- [2] 陈劲松. 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J]. 江淮文史, 169-176.
- [3] 邱仁富.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论纲[J]. 甘肃理论学刊, 2008(4): 41-44.
- [4] 王立.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代意义[J]. 福州党校学报, 2008(3): 52-54.
- [5] 蒋香凤,岳朝晖. 略论推进文化创新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9(1): 153-156.
- [6] 李宏.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问题的思考[J]. 西藏发展论坛, 2009(6): 14-16.
- [7] 吴树新. 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实践的对策探析[J]. 发展研究, 2008(4): 2-5.
- [8] 陈用毅,郑东育. 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 发展研究, 2002(11): 48-50.
- [9] 朱珊. 文化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的选择[J]. 学海, 2005(4): 182-184.
- [10] 曹峰旗,傅明,章瑶. 文化体制改革困境的政治学思考[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2): 34-37.
- [11] 解学芳. 文化体制改革的困境溯源[J]. 理论与改革, 2008(2): 104-107.
- [12] 谢武军. 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和面临的问题[J]. 理论视野, 2009(11): 52-57.
- [13] 白晋虎.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J]. 前进, 2004(3): 35-36.
- [14] 梁勇. 实现文化体制改革新突破[J]. 群众, 2007(4): 8-10.
- [15] 丁和根. 文化体制改革: 关键在于制度创新[J]. 新闻界, 2004(2): 4-5.
- [16] 陈洪博. 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J]. 特区理论与实践, 2001(12): 55-58.
- [17] 胡惠林. 文化体制改革需要改革理论的创新[J]. 探索与争鸣, 2004(3): 43-45.
- [18] 刘学民.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考[J]. 红旗文稿, 2010(17): 26-28.

责任编辑: 陈青云

(E-mail: chenqy@jhun.edu.cn)